

# 从“主动”到“被动”:中英两国工人阶级再生产方式转变比较研究

李 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再生产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国有企业改革前的工人阶级再生产具有一定相似之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生命历程上呈现出强烈的相似性,很大程度是由于两国都曾在制度上对其予以承诺和保障,其后又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改变了这种承诺和保障,使得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方式呈现出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变。引入“国家视角”和“世界体系视角”分析工人阶级再生产并非忽视工人的能动性,而恰恰是为了从宏观角度讨论是什么影响了工人的能动性,重拾对工人微观个体真实生活的关注。

**关键词:**工人;工人阶级;阶级再生产;阶级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7)04-0010-05

## 一、引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加之工党执政的传统,包括煤矿、铁路和钢铁企业在内的很多工业企业都被改组为国有,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英国工人阶级都处于较好的境况。但是,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工党执政逐渐受到冲击。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击败工党,新右翼保守党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始在政策方面向私有化转变,与之相伴的则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乃至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对照同时代的中国,1977年是中国“十年动乱”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的第一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至1978年,中国政府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制与单位制随之逐渐瓦解,与传统产业工人原含有终身契约意义的就业关系也被打破,工人所具有的曾附着其身份的各种权利慢慢丧失,原有在分配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具体到工人阶级自身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其生活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的改变<sup>[1]</sup>。因此,英国传统工人阶级的再

生产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国有企业改革前的工人阶级再生产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结构是客观存在,阶级结构的逻辑结果即是阶级的形成,阶级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函数,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附属现象及必然产物<sup>[2]</sup>。通过批判这种结构简约论(structural reductionism)和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EP·汤普森提出:“阶级的形成是外部决定因素和自我行动的交集,工人阶级塑造自己的同时又被塑造。”这一观点对西方学界的工人阶级研究影响巨大,西方学者开始注重从对工人生活模式的研究入手来探讨阶级的形成,1977年出版的保罗·威利斯的经典著作《学做工》就是这些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在《学做工》中,保罗·威利斯试图讨论“为什么工人的子女自愿成为工人”的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建构了以“文化生产”为表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主张将行动者带回分析中心,关注行动者在结构中的创造,以及行动者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行为方式等内容,通过引入相对独立的文化层次解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拓展和改进了再生产理论的结构化

收稿日期:2017-05-16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老年人健康管理需求的主体性分析”(ZZGCD151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特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路径研究”(13BGL152)

作者简介:李洁(1986—),女,山东菏泽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叙述。

然而,“文化生产”的分析视角虽然通过强调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带来了工人阶级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但也由此导致对工人阶级研究的矫枉过正:对国家视角的忽视,即对工人能动性的过于关注使得国家这一在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被忽视,中国学者引进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时对此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忽略。事实上,文化生产之所以能够进行,恰是由于这一生产过程嵌入在国家制度之中。《学做工》诠释的工人子女以“子承父业”为表现的文化生产及阶级生产方式具有深层的制度背景。从源头看,国家是工人行动所从属的制度框架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工业关系规则的制定者。对工人阶级而言,国家形塑是背景式的存在,在影响工人阶级形成的诸多因素中,“国家”都是关键的一个。比如,国家中心理论(state centered theory)强调,国家是解释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独立变量;而新制度主义则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国家都是“制度”的主要创立者和体现者,制约和形塑人群和组织的行为。国家视角是研究工人阶级再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

## 二、从国家视角到世界视角

沃勒斯坦认为,作为抽象概念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如果不考虑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成员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法律结构,即单纯地进行社会结构研究,会存在局限性。由此,沃勒斯坦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抽象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及法律制度的局限,并倡导应以“世界体系”为分析框架整体性描述世界,反对传统社会科学以单一的“国家”和“社会”为单位进行分析<sup>[3]</sup>。就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郑杭生提出“两维视野”的概念:“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两种力量并具有两个维度,第一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是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sup>[4]</sup>

“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对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即必须对生产过程以外的诸多因素进行考察来全面解释工人阶级的形成,包括文化、历史、生活方式、个人经历、宗教传统乃至仪式习俗<sup>[5]</sup>。尽管中英两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

社会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两国工人在“阶级经历”上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工人曾经拥有较高的福利待遇、工人及其子女的自我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等。一方面,这种相似的阶级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产物,另一方面,两个遥远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命历程呈现出强烈的趋同性本身,就使得在全球化视角下跨越边界讨论阶级再生产问题存在必要性。因此,引入国家视角乃至世界视角比较研究中英两国的工人阶级,能够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补充“文化再生产”理论,即如果是文化影响了生产,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文化;在实践中则能够真实呈现出工人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究竟哪些是“主动”哪些又是“被动”,客观定位工人的主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家制度所需要做出的对工人的必要支持。

## 三、中英工人阶级传统的再生产方式

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选择英国一个工业城镇中12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小子”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从学校到工厂后的最初一段工作经历进行研究来阐释“子承父业”的问题,即“为什么工人的子女自愿成为工人”,并试图解释“小子”们的行为与阶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保罗·威利斯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一种具有主动性和自愿性的过程,即工人子女自身缺乏向上流动的兴趣和动力,他们对自身生活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亚文化,鄙视中产阶级或试图成为中产阶级的行为是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这种现象反映出工人阶级自我建构的主动性以及反学校文化的张力,然而,如果沿着“为什么工人的子女自愿成为工人”的问题接着讨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工人的子女自愿成为的是工人而非其他呢?”即为什么是“学做工”,而不是“学其他任何一种工作方式”。这是因为工人子女受制于其工人的父母,进而受制于工人阶级生活本身。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当时的工人阶级生活本身呢?从历史维度来看,作为最早实行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其社会福利制度,工人阶级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无法忽视的力量,并实现了政党化。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前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质不断积累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产业工人力量的壮大,英国工人阶级在经历了工业革命最初的残酷状况后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在这一阶段,英国工人阶级不但

能够保障自身良好的生存状况,更是形成了发达的亚文化。在强烈的阶级认同下,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了主动的自我再生产。保罗·威利斯提出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概念,集中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亚文化:“小子”们反抗学校以及教师的权威,轻视遵守学校规矩的“小耳朵”,对学校规范不置可否甚至明确无视和有意违反,着装奇异、喝酒抽烟;不遵守学校作息时间表,比如旷课、迟到、上课睡觉、在课堂上随意走动、在走廊来回闲逛及聚众观望等;嘲笑蔑视学校权威,彼此间用粗俗的言语互相嘲弄或作为打招呼的方式,通过破坏公物、违反规则以及偷窃打架等行为获得刺激感和兴奋感,而这被认为是“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表现,“工人理应如此”。保罗·威利斯认为,“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表明他们洞察或部分洞察甚至批判了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固化的阶级不平等现实。“小子”们的这种亚文化是批判式的,含有主动选择的意味。

与英国工人阶级所经历的黄金期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同样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期,即新中国成立直到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前这一时期。在理论上,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了其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以及随后展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工人通过自己的建设热情和建设能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家也通过“单位制”和“劳保制度”对工人予以保障,承诺了对工人终身就业的隐性契约关系以及附着其上的较高的福利待遇。在单位制背景下,国家通过党政系统对生产进行直接控制,在教育工人掌握生产实践所必备的技能和文化的同时,将“劳动者的尊严感”输入到工人的意识中,把工人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这不仅获得了工人对国家及政党的认同,也建构起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主体性。这种由国家唤起的“阶级意识”又通过“单位”提供的各种生活福利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最终转化成为一种道德的、情感的甚至是美学的形式<sup>[6]</sup>。

在此背景下,经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人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就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以此为契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工农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举办了大量工人文艺方面的活动,如展览和

文艺会演等。尽管当时中国工人群体和工人文化并不具备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主客观条件,但这种文化传播方式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在工人阶级意识不够明确的时候反过来强化了其阶级意识<sup>[7]</sup>。在这一阶段,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工人阶级的自我再生产并不被认为是强烈的阶层固化,而被视为一种光荣的延续和发扬。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下,工厂将自身的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相互重合,工厂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特点,国家和工人彼此之间处于良好的认同中,并由此促进了工人阶级自身强烈的自我认同。基于这种国家认同和自我认同,工人子女继续当工人就成为主流选择,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子承父业”之方式——“接班”。而在工人阶级内部,尤其是工人子女之间也产生了类似于“子弟”的亚文化。在依托工厂建立的子弟学校里,因为“接班”这一既是保障又是束缚机制的存在,工人子女对知识的学习和教育制度本身,抱持一种掺杂着“不屑”“无所谓”“学习无用”“反正都是当工人”等的复杂态度。

#### 四、中英工人阶级再生产方式的转变

纵观中英两国产业工人传统的阶级再生产方式及其转变,在阶级经历上两国工人存在一条相似的主轴线:英国和中国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都曾给予工人良好的社会福利,并在随后出于各自改革的需要调整和改变了这些福利承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人阶级由主动的阶级再生产向被动的阶级再生产转变。这种国家改革从内部看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外部看则是全球化浪潮下适应国际环境的需要。对于中英两国的工人来说,则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的改变也使工人改变了对自己生存及生活方式的主观感受,更改变了其“主动再生产”的阶级再生产方式。改革之后的工人阶级再生产是一种被动阶级再生产,即由于社会资本起点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流动难以实现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不但工人及其子女不再愿意主动成为工人,而且当工人及其子女在试图实现社会流动时会遭遇重重障碍。

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执政后,在英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自1984年开始,英国关闭了140个煤矿,约15万人失业。其中,发生在1984至1985年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可以说是一个影响英国煤炭行业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的政治

行动,即使在被视为英国最强有力工会的英国矿工工会领导之下,这次罢工仍然以失利告终。这不仅削弱了整个英国工会的作用,而且成为撒切尔政府在控制打压工会策略上的重大标志性胜利,英国工人阶级受到重挫。与此同时,英国则迎来了金融中心和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凯旋<sup>[8]</sup>。在从事田野调查的年代,保罗·威利斯坦言:“也许正赶上了充分就业的英国工人阶级最后一个黄金时期的尾巴,至少(我所调查的12个)‘小子’们都找到了工作。”但在此之后,全球范围的资本转移以及“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原本能够提供给既无技术又无文凭的工人及其子女们的较为低端的所谓“工人阶级工作”日益减少,尽管在主观上工人及其子女对这类工作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就业兴趣,但客观事实是“没有工作的工人阶级”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常态<sup>[9]</sup>。此外,原本属于“工人阶级的骄傲或自尊”又使得他们不愿或者不屑于从事更为辛苦、在他们意识里应当由外来移民或其子女所从事的“低端”工作,由此而处于间断性失业(intermittent unemployment)甚至长期失业状态<sup>[10]</sup>。新的社会形势使原先相对固定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失业或者无法就业的青年们不但没有经济收入,而且从学校生活到工作阶段的过渡期内原本存在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适应也被迫中断。即使那些还有工作的青年工人,他们虽然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外部特征,但随着女性劳动力在制造工人中的大量涌现,以及大众审美倾向的去工业化,曾经被视为工人阶级文化重要表现形式的“男子气概”也变得“过时”,再加之服务业成为就业人员的主要容纳器,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原来传统产业工人的形象<sup>[11]</sup>。可以说,工人阶级主动而自愿的阶级再生产失去了宏观社会环境的保障而难以为继。

就中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国有企业尤其国有工业企业进入一个全面再造的改革阶段,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而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与之相应,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角色地位及其所能够和需要吸纳的工人数量和质量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直接导致传统工人阶级的结构性改变,进而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方式。政府责任的退出打破了原来国家与工人之间终身就业

的隐性契约关系,取消了原本提供的较高福利待遇,但却没有及时为工人提供新的、有效的福利甚至基本保障制度,使得工人处于制度断裂的夹缝中。具有时代和国情特色的“下岗”所弥漫的失业氛围,对工人社会身份的形成产生了直接作用,乃至产生了划分身份界限的符号象征作用<sup>[12]</sup>。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消失:一是“接班”这种特定时代带有福利色彩的阶级再生产方式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二是成为工人也不再是基于强烈认同之下的骄傲和自豪,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迫不得已。此后,中国传统产业工人朝着两个方向分化:或转换身份角色积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佣者;或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岗成为潜在或实际失业者。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再形成”(remaking),那么后者则更多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解”(unmaking)<sup>[13]</sup>。然而,无论是阶级的“再形成”还是“消解”,阶级生产状态变化都变成一种“被动”的结果,而不是工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 五、“被动阶级再生产”与社会阶层固化

事实上,在传统阶级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接班”,都会造成一定社会阶层固化。所谓社会阶层固化是相对于社会流动而言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变化”,个人和群体很难实现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对“小子”们来说,虽然他们的反学校文化意味着他们部分地洞察和批判了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阶级不平等固化的现实,然而悖论的是,这种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在洞穿文化霸权和支配性统治秩序的同时却进一步强化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最终形成了对他们自身的反叛,让他们成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工人<sup>[14]</sup>。对中国接班的“子弟”来说,单位制的实施所带来的一个突出的意外后果是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制度虽然给个体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资源,但也极大地限制了个体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与机会,形成一种狭隘的生活空间和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以及依附性人格。事实上,除了“接班”,工人子弟并没有其他更多的流动机会和流动方式。但是,在主动的阶级再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具有较好的保障,社会阶层的固化在某种程度上含有一定的主动选择成分。这种

主动选择是文化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主动阶级再生产不但实现了阶级的自我认同,而且保证了国家政治制度的运转。

然而,当今时代的社会阶层固化则明显表现为工人及其子女上升渠道的堵塞,以及工人生存状态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甚至造成了贫穷的代际遗传。这不但使得工人无法实现自我认同,而且还造成了工人对国家制度的认同问题。当今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各国中相对缺乏保障和工作环境相对较为严苛的。在西欧各国中,英国是唯一对每日、每周休息时间不作法律规定以及对每日最长工作时间不进行法律限制的国家。英国工人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44小时,高于欧洲周平均工作时间的39小时;英国国内有将近16%的工人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而将近25%的工人则经常或非经常地进行夜班工作,将近66%的制造业工人倒班工作,并且没有法定工资照付的休假<sup>[15]</sup>。就中国传统产业工人而言,虽然市场化改革同样给产业工人带来了利用市场的机会,并有助于个体摆脱单位制的束缚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是,由于原有体制的潜在后果,如单位意识的束缚、良好职业技能的缺乏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及时完善过渡保障机制,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终身就业及附着于其上的保障权利,而且成为市场化进程中付出代价较大的群体之一。这种冲击延续到其子女身上,进一步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工作等整个人生际遇<sup>[16]</sup>。

在讨论工人阶级再生产问题时,“文化生产”给工人阶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主动性视角,即在阶级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然而,在当代工人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由于文化生产的国家制度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再生产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因此,如果说《学做工》曾经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人的子女自愿成为工人”,那么这一经典研究在当代时代的意义之一则是“为什么工人子女不再学做工了,即不再自愿成为工人了”。而重新引入“国家视角”乃至“世界体系视角”分析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并不是无视工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也并非忽视对工人生活模式及其个体命运的关注,而正是为了从宏观角度讨论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工人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发挥,以及是什么影响了

工人的生活模式及其个体命运,重拾对工人微观个体的真实生活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1] 魏杰,李东红.30年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评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23-28.
- [2] 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9(5):165-188.
- [3] 龙向阳.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D].广州:暨南大学,2003.
- [4]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0(6):55-64.
- [5]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6] 李静.瓦解与重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1999—2011)[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 [7] 牟岱.时代变迁中的中国工人文化——从主流文化走向亚文化的沉淀定位[J].当代工人(精品版),2009(1):14-16.
- [8] 齐泽克:英国煤矿工人们吹着小号,下岗了[EB/OL].破土网,2016-04-28.
- [9] Weis, L. Working Class without Work: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10] 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J].社会学研究,2006(2):230-242.
- [11] Aronowitz, S. Foreword [M] // Dolby, Nadine & G reg Dimitriadis (eds.)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Ralmer, 2004.
- [12] 佟新.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失业危机”对工人的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2(6):1-12.
- [13] 刘建洲.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消解”与“再形成”——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考察[J].人文杂志,2009(6):176-185.
- [14] Apple, Michael W. Education and Power (2<sup>nd</sup> E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5] 米克·布鲁克斯,郭懋安.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J].国外理论动态,2006(7):22-25.
- [16]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G]//李友梅,孙立平,沈原,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文 川]